



第六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3(a)、18、19(a)、116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主要大型会议和
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2002 年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以及 2008 年
审查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21 世纪议程〉
方案》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的执行情况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可持续发展融资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的报告

一. 任务授权

1. 大会在其第 66/288 号决议中批准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题为“我们想要的未来”的成果文件。在该决议附件第 255 和第 256 段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声明：

255. 我们商定由大会主持设立一个政府间进程，由联合国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同有关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公开、广泛的协商。该进程将评估筹资需求，审议现有工具和框架的实效、一致性和协同作用，评价进一步的举措，以编写一份报告，提出有效的可持续发展融资战略备选方案，推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调集并有效利用资源。

256. 一个由区域集团提名的 30 名专家组成、体现公平地域代表性的政府间委员会将负责落实上述进程，到 2014 年完成工作。

* A/69/150。

** 由于技术原因第二次重发(2014 年 12 月 23 日)。



2. 大会在其第 67/203 号决议中请政府间委员会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开始前介绍其最新工作进展。

3. 大会在其第 67/559 号决定中欢迎联合国五个区域组提名的专家委员会 30 名成员。该决定授权各区域组为本区域组所属委员会专家成员指定候补成员，自有关区域组通知大会主席和委员会之日起生效。各区域组已提名的委员会候补专家成员名单载于本决定附件二。

二. 组织事项

A. 工作安排

4. 已举行了下列会议：第一届会议(2013 年 8 月 28 日至 30 日，6 次正式会议)；第二届会议(2013 年 12 月 2 日至 6 日，10 次正式会议)；第三届会议(2014 年 3 月 3 日至 7 日，9 次正式会议)；第四届会议(2014 年 5 月 12 日至 16 日，10 次正式会议)和第五届会议(2014 年 8 月 4 日至 8 日，8 次正式会议)。

B. 开幕

5. 2013 年 8 月 28 日，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代理主席(秘鲁)宣布会议开幕并致辞。主管经济发展助理秘书长也代表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致辞。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6. 在 2013 年 8 月 28 日举行的第一届会议第 1 次会议上，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举 Pertti Majanen(芬兰)和 Mansur Muhtar(尼日利亚)担任共同主席。

D. 议程

7.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临时议程(A/AC.282/2013/1)，内容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的后续行动，关于编写一份报告，提出有效的可持续发展融资战略备选方案，推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调集并有效利用资源。
4. 其他事项。
5. 通过报告。

E. 工作方式

8.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其工作方式。¹

¹ 见 <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dex.php?menu=1558>。

9. 在 2013 年 8 月 29 日第一届会议第 3 次会议上，委员会商定按下列三个专题组安排工作：

1. 评估筹资需求、查明当前的资金流动和新出现的趋势以及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
2. 调动资源并加以有效利用：
 - (a)国内资源(公共和私人)：提高实效和调动额外资源；
 - (b)外部资源(公共和私人)：提高实效和调动额外资源；
 - (c)混合融资(国内和国际)及新倡议。
3. 机构安排、政策一致性、协同作用和治理。

F. 政府间专家委员会记录

非公开会议

10. 根据其工作方式，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在全会上以互动形式进行。

公开会议

11. 2013 年 8 月 30 日，委员会向大会通报了工作情况(根据大会第 67/203 号决议，第 7 段)。委员会还在 2014 年 5 月 16 日就委员会工作进度举行了公开通报。

12. 2013 年 12 月 5 日、2014 年 3 月 3 日、5 月 12 日、7 月 18 日和 8 月 5 日，委员会同会员国、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商业部门和其他参加 201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大会、发展筹资审议进程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主要团体举行了多方利益攸关方互动对话。多方利益攸关方对话之后举行了公开通报。

13. 2014 年 3 月 5 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举行了联席会议。

其他会议

14. 委员会在圣地亚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赫尔辛基(欧洲)、亚的斯亚贝巴(非洲)、沙特阿拉伯吉达(阿拉伯区域)和雅加达(亚洲)举行了区域外联会议。此外，还在不同地点组织了许多非正式外联活动和多方利益攸关方对话，包括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活动。

G. 通过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的报告

15. 委员会在 2014 年 8 月 8 日第五届会议第 8 次会议上通过了其报告草案，该草案载于提交给大会审议的一份非正式文件中。

三. 引言

16.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国际社会同意开展一项重要工作，促进全球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使人类免受贫困和饥饿(见会议成果文件，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大会在其第 67/559 号决定中设立了可持续发展融资政府间专家委员会，委派该委员会制定可持续发展融资战略的备选方案，以促进资源调动及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有效利用。

17. 在会议上，会员国重申《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的所有原则，包括，除其他外，其原则 7 所阐述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18. 委员会的工作立足于会议成果文件中阐述的原则和《联合国千年宣言》(大会第 55/2 号决议)中阐述的普遍价值观，注意到，和平和包容性社会、性别平等和人人享有包括发展权在内的人权，是可持续发展强有力的促成因素。消除贫穷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全球挑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19. 2002 年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所达成的《蒙特雷共识》²为委员会的分析提供了基础，强调使用一切形式融资，包括全盘利用公共、私人、国内和国际融资，并且认识到各国对自身发展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全球社会有责任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委员会也认识到需要更新这一框架，以应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挑战。

20. 在这方面，委员会留意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的工作，并以会员国的决定为指导，即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应基于整合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的一致办法，加强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该办法包括致力于订立一套具有普遍性、适用于各国的全球目标，同时考虑到不同的国情，并尊重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

21. 立足于促成《里约宣言》和《蒙特雷共识》的方式和精神，委员会与包括民间社会、商业部门和其他主要团体在内的各种利益攸关方进行广泛协商。此项外联工作是委员会工作的整体组成部分，包括多方利益攸关方磋商、举行区域会议和呼吁为其网站捐款。委员会对收到的所有投入表示感谢。

22. 委员会在进行分析时首先是评估可持续发展的融资需求、目前的资金流和潜在的资金来源。委员会发现，需求是巨大的，满足这些需求面临严峻挑战——但并非不可克服。事实上，全球的公共和私人储蓄足以满足这些需求。然而，目前的融资和投资模式显然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投资预期收益往往并不像其他机会那样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近期。同时，存在许多对公共资源的竞争性需求，政府无法调动足够的公共融资进行追求利润的投资者所回避的必要投资。

²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2.II.A.7)，第 1 章，决议 1，附件。

23. 该解决方案包括更好地协调个人意愿与公共目标，创建一个鼓励在这些领域进行营利性投资的政策框架，同时调动公共资源用于基本的可持续发展活动。资金质量也很重要。因此，重要的是要努力减少腐败，并采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更有效的公共部门政策。政策和激励措施也应着眼于更好地协调投资者偏好与投资需求，举个例子，长期可持续发展需求不能用短期资金来供资。

24. 委员会工作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种简单的政策解决方案。相反，有必要制定包括政策选择、规章、机构、方案和文书工具包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政府可从中选择适合的政策组合。委员会推荐一种连贯一致的做法，将国家融资战略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整体组成部分。虽然政策拟订和执行是国家一级的事项，但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合作。委员会的方法基于国家所有权原则，得到更有力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支持。委员会发现，协同努力，依靠所有行为者并综合调动所有资源，同时尽可能提高其影响力，将使委员会能够为实现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投资提供资金。

25. 委员会报告中的分析部分从讨论融资需求和近期的融资流动趋势开始。然后，通过从来源到使用对资金流动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了“战略办法”。报告的很大篇幅(第六节)用于审查政策选择，以加强可用于资助可持续发展的融资资源调动的四个基本类别，即国内公共融资、国内私人融资、国际公共融资和国际私人融资，另外重点关注协调官方资源与私人资源的手段及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协作。在该节中，委员会强调不同类型融资的相互影响及其潜在的协同增效作用。在第七节，委员会提及强有力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治理所需的国际政策要求，充分认识到，国际经济架构破裂将破坏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项目。最后讨论了未来发展路线的选择。

四. 全球背景

A. 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

26. 自 2000 年通过《千年宣言》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经济体快得多。例如，2005 年至 2012 年间，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年均增长 1.2%、发展中国家为 6.1%，³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正在缩小(见图一)。在此背景下，全球贫困大幅减少，世界提前五年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 1 中的具体减贫目标。千年发展目标的其他几个具体目标也提前实现，包括获得改进过的饮用水、初等教育中的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另一些目标正在有序实现，例如抗击疟疾和结核病目标。⁴

³ 按不变价格计算；见《2014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4.II.C.2)。

⁴ 见《2014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2014 年，纽约)。

27.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仍存在着差距，在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方面仍有许多未竟的事业。近十亿人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许多人的生活略高于贫困线，很容易因负面冲击而重新陷入贫困。这种脆弱性往往与性别、残疾、种族、土著化和地理位置有关。其他发展挑战包括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以及与城市发展有关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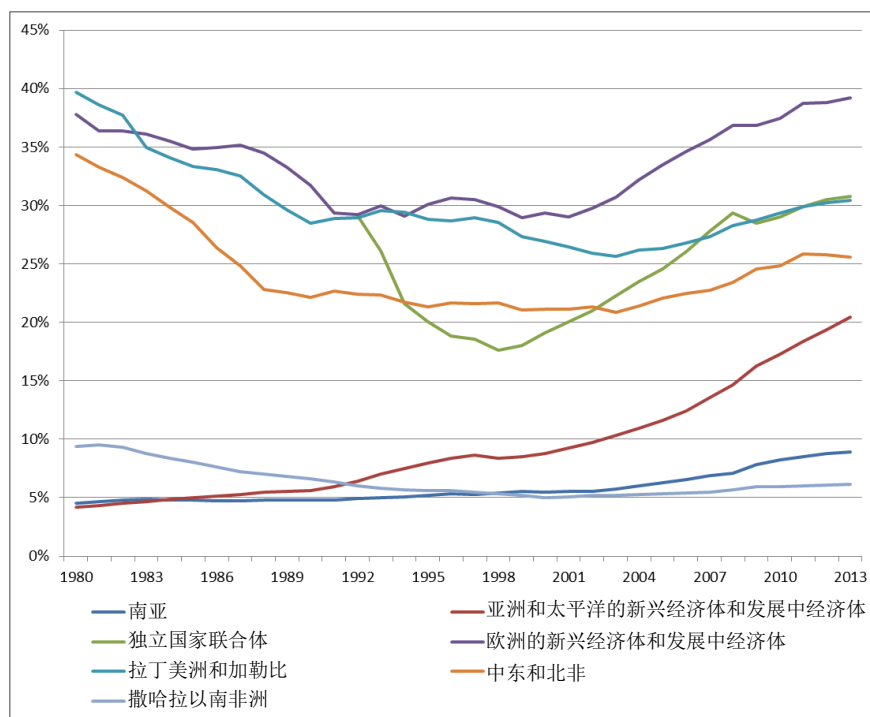
28. 发展不充分与若干因素有关，包括各区域的增长率有差异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在缩小，反映了东亚地区以及欧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尽管自 2000 年以来有所改善，一些国家仍未从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增长疲软中恢复。实际上，与 30 年前相比，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中东和北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差距变大(见图一)。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仍然太慢，不足以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⁵

29.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加重，社会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同样高企。但也有例外，例如，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得到缓解，突显了公共政策能够产生影响。⁶

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014 年全球发展纵览：提高生产率，满足中等收入国家的挑战》(经合组织出版社，2014 年，巴黎)。

⁶ 《2013 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不平等事关重大》(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13.IV.2)。

图一
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计算基于《世界经济展望——复苏增强，仍不均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华盛顿特区)。

30. 风险和脆弱性也变得更加明显。环境恶化、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对全球环境(如海洋、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的其他威胁，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构成额外挑战。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系统中的风险以及国家对外部金融创伤的脆弱性，对各国调动资源促进发展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显然，如果没有稳定的金融系统，2015年后发展议程就有可能因突然爆发区域或全球金融危机而脱轨。

B. 融资需求的范围

31. 在此背景下，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融资需求仍然相当可观。这些需求包括应对：(a) 与消除贫困和饥饿、改善保健和教育、提供负担得起的能源和促进性别平等有关的基本需求；(b) 国家可持续发展投资的融资需求，如基础设施、农村发展、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发展和能源所需投资；以及(c) 全球公益物，包括保护全球环境、对抗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以及其他领域。

32. 对需求进行量化是复杂的，也必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估算值取决于对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在部门和整个经济层面上)以及国际规则、规范和标准等要素的一系列假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成本也取决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融资需求

的估算值差异很大。本报告中提出的估算值是象征性的，旨在表明融资需求的数量级，而不是精确数字。此外，委员会没有试图按经济部门、需求类型或国家类别将需求估算值合并为全球预算，因为，除其他外，这种汇总行为并未充分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协同作用及其贯彻各领域的性质。

33. 有关社会需求，用于消除所有国家极端贫困(衡量标准为最贫困人口日均收入增加到 1.25 美元)的全球安全网的费用粗略估计为每年约 660 亿美元。⁷ 确认解决饥饿、保健和教育需求也有大量投资要求。⁸ 最终，消除贫困需要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及创造就业机会。在这方面，全球每年对水、农业、电信、电力、交通、建筑、工业和林业部门等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估计为 5 万亿至 7 万亿美元。⁹ 有证据表明，许多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往往是就业的主要提供方，而它们很难获得融资。发展中国家中小型企业未满足的信贷需求估计高达 2.5 万亿美元，全球约为 3.5 万亿美元。¹⁰

34. 在提供全球公益物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融资需求。用于“适于气候”和“可持续发展”方案(包括与气候有关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的额外投资需求的数量级估计是每年数万亿美元(见图二)。¹¹ 在评估融资需求时，应当理解，不行动的成本甚至大于行动成本，特别是对最贫穷人群和气候变化领域而言。例如，从中长期来看，特别是对于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言，推迟缓解行动，预计将大幅增加向低碳经济转型所需的成本。¹²

35. 融资需求也因国家和区域的不同而不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融资需求与其经济规模相比太大，而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非

⁷ 见 Laurence Chandy and Geoffrey Gertz, “Poverty in Numbers: The Changing State of Global Poverty from 2005 to 2015”, Global Views Series, No.18(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1)。

⁸ 其中一些需求的估算包括：在 2025 年前每年 502 亿美元用于消除饥饿；370 亿美元用于实现全民保健；420 亿美元用于实现普及初等教育和扩大接受初中教育的机会。见 Romilly Greenhill and Ahmed Ali, “Paying for progress: how will emerging post-2015 goals be financed in the new aid landscape?”, Working Paper No. 366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3)。

⁹ 见联合国系统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工作组，背景文件 1；绿色增长行动联盟的报告，“绿色投资报告：利用私人资金促进绿色增长的途径和方法”，(世界经济论坛，2013 年，日内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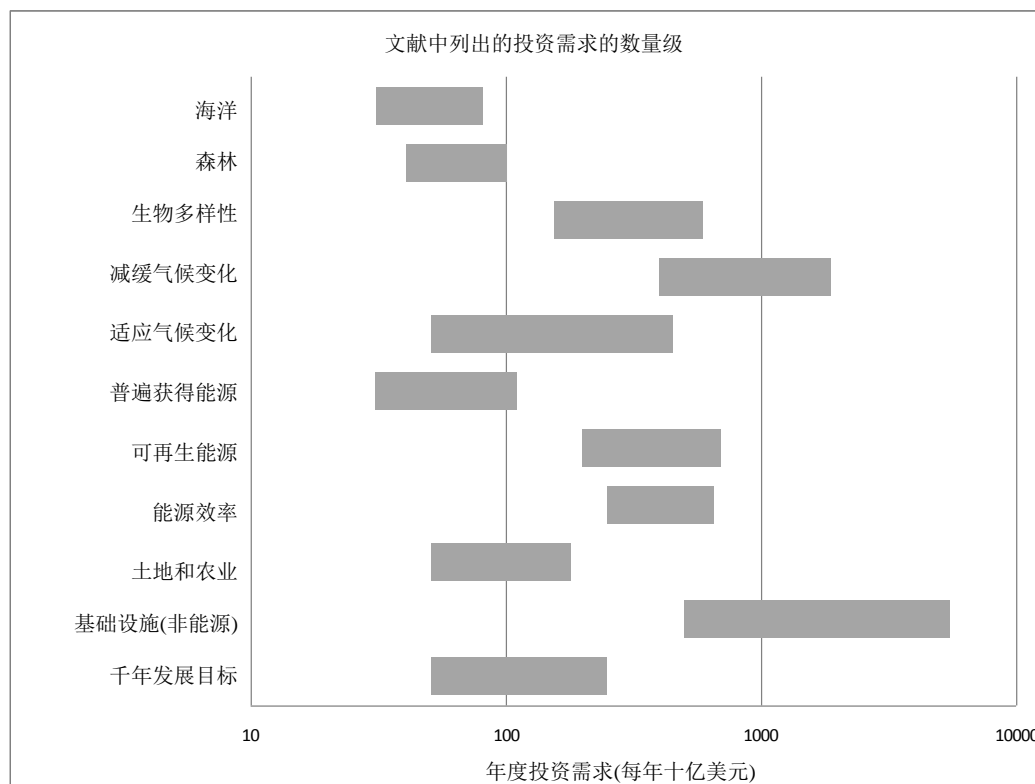
¹⁰ 见 Stein, Tony Goland and Robert Schiff, “Two trillion and counting: assessing the credit gap for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and McKinsey & Company, 2010)。

¹¹ 见联合国系统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工作组，背景文件 1。

¹² 见对第三工作组对下述文件提出的意见：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洲国家和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具有特殊需求。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也应得到解决。

图二
文献中列出的各部门投资需求的数量级



资料来源：联合国系统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工作组，背景文件 1，X 轴为对数尺度(见 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dex.php?menu=897)。

C. 资源流动的新模式

36. 尽管需求巨大，但资源流动的新模式突显出调动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融资机会。尽管因为危机而暂时减少，但全球储蓄依然强劲，每年约为 22 万亿美元(包括公共和私人来源)。¹³ 全球金融资产总量(仅占全球每年储蓄的一小部分)估计约 218 万亿美元(见 [A/68/357](#))。即使资源分配方式发生很小的变动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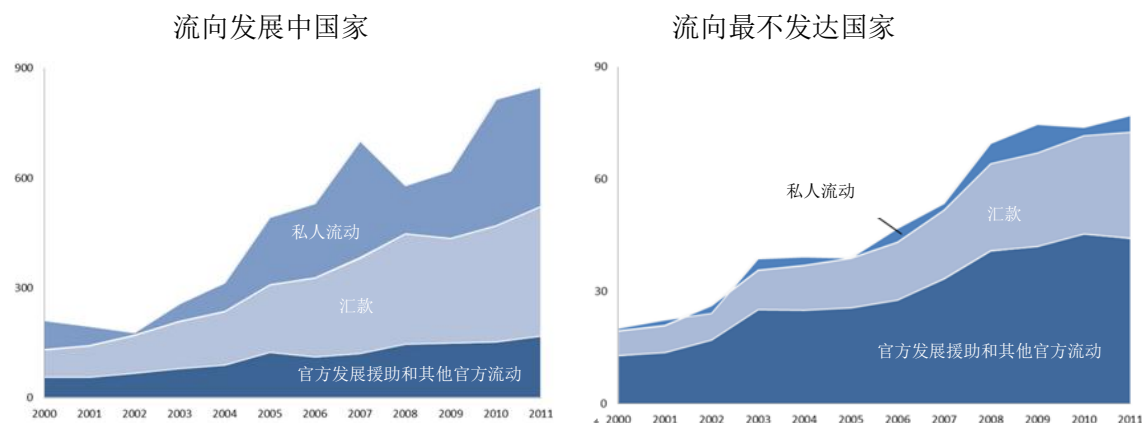
¹³ 计算基于《世界经济展望——复苏增强，仍不均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 年 4 月，华盛顿特区)，以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

37. 自 2002 年以来,所有这四类融资(公共和私人、国内和国际)均有所增长。近年来,国内融资迅速增长,迄今为止占大多数国家融资来源的最大份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国际公共融资仍然至关重要。¹⁴

38. 在过去十年里,主要受私人资本流动和汇款增长的驱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迅速增加,不过,如图三所示,官方发展援助也有所加强。

图三

融资流动(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数据以及世界银行关于移民和汇款的数据。

国内公共资源调动

39. 2002 至 2011 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公共融资增加了一倍多,从 8 380 亿美元增至 1.86 万亿美元。¹⁵ 从绝对值来看,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低收入国家的国内公共融资也翻了一番,但仍不足以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在低收入国家,税收约占其国内总产值的 10%至 14%,该比率比中等收入国家低约三分之一,并且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税收达到其国内总产值的 20%至 30%。¹⁶

40. 在许多国家,逃税和避税阻碍了国内资源调动。此外,包括跨界逃税在内的非法资金外流破坏了税收。非法秘密资金流动估算值差异巨大,但数量可观。¹⁷

¹⁴ 见联合国系统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工作组,背景文件 2 和 3 以及委员会区域外联活动摘要,可查阅: 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dex.php?menu=1558

¹⁵ 见 <http://capacity4dev.ec.europa.eu/ffd/document/data-2000-2012-delinked> 的发展融资数据。

¹⁶ 世界银行,《2015 年后的发展筹资》,2013 年。

¹⁷ 联合国系统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工作组,背景文件 2。

41. 国内公共资源还受到补贴的影响。例如,2011年的税前能源补贴总额为4 800亿美元(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税后能源补贴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主要是在发达国家)。¹⁸ 同样,在农业部门,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生产者支助补贴总额为2 590亿美元。¹⁹ 消除这些影响将把公共资源重新分配给其他优先事项。但是,在所有补贴决定中,无论是通过适当的补偿政策或是通过进一步提高针对性,都有必要解决对穷人和环境的任何不利影响。

42. 自《千年宣言》发布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2013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6%,而十年前占33.5%。²⁰ 根据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的规定,重债穷国的债务困难已基本得到解决。

43. 受低利率环境的推动,一些属于重债穷国的国家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发行债券。以本国货币发行公共债务的行为(不同于外债,发行国不会受外汇风险的影响)也有所增加,反映了当地资本市场的发展。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当地货币政府债券从2005年的110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310亿美元,²¹ 但是,增加的发行量大多数是短期债券。国内和国际债务增长过快,对经济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突显出债务管理需谨慎。

44. 然而,总体状况掩盖了一些国家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目前,两个低收入国家被认为受到债务困扰,14个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28个国家处于中度风险状态。²² 一些小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尤为严重。2013年,小型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平均达到107.7%,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为26.4%。²⁰ 同期,一些发达国家也遇到了主权债务困扰。

国内私人融资

45.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主要依赖于银行业。虽然国内信贷在过去十年大幅增长,但许多国家银行部门的信贷主要是短期的。例如,在一些非洲国家,短期信贷占银行融资的90%,²³ 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为50%至60%。²⁴ 此外,

¹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将消费者补贴定义为包括两个部分:税前补贴(如果企业和住户支付的价格低于供应和分配成本)和税收补贴(如果税款低于其效率水平)。基金组织,《能源补贴改革——教训和启示》(2013年,华盛顿特区)。

¹⁹ 经合组织,《2013年农业政策监测和评价:经合组织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经合组织出版社,2013年,巴黎)。

²⁰ 《全球促进发展伙伴关系状况-千年发展目标差距工作队2014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4.I.7)。

²¹ 这一数字是2013年非洲金融市场倡议数据库中29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数据。

²² 基金组织中低收入国家(有资格利用减贫与增长信托的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报告表(2014年6月5日),2014年7月28日查阅。见 www.imf.org/external/Pubs/ft/dsa/DSAlist.pdf。

²³ Kangni Kpodar 和 Kodzo Gbenyo,“短期和长期信贷与经济业绩的关系:来自西非经货联盟的证据”WP/10/115号工作文件,(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5月,华盛顿特区)。

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储蓄总额仍然明显低于推动可持续国内投资所需的金额。

46. 主要受主权债务问题的推动，国内债券市场也取得了显著发展。虽然公司债券市场也在发展，但规模仍然很小。平均而言，2010年，相较于发达国家的34%，中等收入国家的私人债务证券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缺乏长期债券市场限制了许多国家长期融资的可利用性。同样，在高收入国家，股票市场的深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60%，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仅占到20%和28%。¹⁷

47.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机构投资者不断增多，并有可能增加用于可持续发展长期投资的资源。据估算，新兴市场的养老基金管理着2.5万亿美元资产，该数字预计还将大幅增长。²⁵ 这些投资组合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国内主权债务。包括南非、加纳、智利、墨西哥和秘鲁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养老基金也直接投资于国家或区域的基础设施。

48. 此外，人们越来越重视投资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公司就这些因素提交报告(被称为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并签名参加负责任的投资原则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等倡议。然而，相对于全球资本市场而言，投资主题占环境、社会和治理考量的份额仍然较小，2010年，在12 143 亿美元的全球资本市场中，投资仅占7%，为611 亿美元。²⁶

国际公共融资

49. 随着在2002年通过《蒙特雷共识》，官方发展援助对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在数量增加的同时，正逐渐关注如何使官方发展援助更有效。在2011年和2012年出现下降之后，2013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创出新高，净值达1 348 亿美元。²⁷ 然而，仅有5个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方达到了占国民总收入0.7%的目标。

50. 官方发展援助继续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许多非洲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受冲突影响国家，提供必要的金融和技术合作(见图三)。在每年人均政府开支不到5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大多数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平均占其国际资源流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约占政府收入的三

²⁴ 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库，见 www.bis.org/statistics/。

²⁵ Georg Inderst 和 Fiona Stewart, “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机构投资，潜在模式简介：第 6780 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世界银行，2014 年，华盛顿特区)。

²⁶ 负责任的投资原则是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融资倡议和联合国全球契约合作的投资者倡议；图形依据负责任的投资原则，《2011 年进展报告》。

²⁷ 经合组织，“2013 年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反弹，达到历史新高”，2014 年。见 www.oecd.org(2014 年 8 月 15 日查阅)。

分之一。目前，约 40% 的官方发展援助投向最不发达国家。²⁸ 但近年来，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有所减少，捐助方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种趋势有可能持续下去。²⁸

51. 在自愿基础上，创新性发展筹资领导小组率先采用一些筹资机制，以筹集更多资源，包括在机票中征收国际团结税，²⁹ 所得资金捐给国际药品采购机制，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购买药品。有 11 个使用欧元货币的国家目前正在设想自 2016 年起征收货币交换税，但迄今还没有专款专用的资金用于全球公益物的发展或融资。一些国家(例如法国)已在国家一级设立货币交换税，作为用于资助官方发展援助方案的收益的一部分。³⁰

52. 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国际资金和交付渠道也快速扩张，其中包括全球部门基金，以汇集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以及传统和新兴捐助方，如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免疫联盟和全球促进教育伙伴关系的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为基础。

53. 仅在 10 年前，多边气候融资还由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的少数大型资金供资。目前有 50 多个国际公共资金。在此期间，政府谋划并改革了一些机构，如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适应基金、气候投资基金和最近的绿色气候基金以及不断变化的新金融工具，如针对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产生的排放(减排)及森林养护的基于业绩的付款。然而，气候融资需求与资源之间仍存在着巨大差距。特别是，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融资承诺进展缓慢。

54. 南南合作是对南北合作的补充，并且在继续快速增长，2006 至 2011 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虽然关于南南减让性资金流动的数据不完整，但据估算，其 2011 年的总额在 161 亿至 190 亿美元之间，比全球公共资金流多 10%。近年来，南南非减让性流动，如外国直接投资或银行贷款也急剧扩大(见 E/2014/77)。

国际贸易和跨界私人融资

55. 全球贸易也在继续增长，但与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暴发前相比，速度有所放慢，贸易流动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源调动而言其重要性有了增加。对于最不发达

²⁸ 2012 年，官方发展援助的 32%(包括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净值和估算的多边官方发展援助)直接分配给最不发达国家，在未按国家分配的官方发展援助中，约 52% 可能也归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使总量达到 40%。(发展援助委员会，关于“将官方发展援助给予最需要的国家”问题的讨论文件，(经合组织，2014 年)，可查阅：www.oecd.org/dac/fianciongdevelopment.htm)。

²⁹ 截至 2013 年，征收此税的国家包括：喀麦隆、智利、刚果、法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尼日尔和大韩民国(此外，巴西未征收此税，但为预算提供捐款，数额相当于征收此税)。

³⁰ 若干国家决定暂不执行这些协议。

达国家来说，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从 1990 年的 38% 增至 2011 年的 70%。³¹ 贸易中的全球价值链增加，使贸易和投资流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56. 2013 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 7 780 亿美元，超过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是私人部门外国投资最稳定的长期来源。然而，最不发达国家仅获得这些资金流的一小部分(不到 2%)。³²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投向采掘业，与其他经济部门联系有限。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不是整齐划一的。例如，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投向金融和房地产的比率从 1985 年的 28% 增至 2011 年的近 50%，而同期对制造业的投资比率从 43% 降至 23%。³³

57. 在过去 15 年里，新兴市场的国际证券投资的性质发生了演变，许多国家的市场深化，全球一体化程度加深。特别是，随着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外国投资者购买更多的当地货币债券，目前在一些新兴市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这些流量波动非常大，反映了国际资本市场的短期方向(见 A/68/221)。例如，在美国，股票平均持有期从 1960 年代的 8 年左右降至 2010 年的约 6 个月。³⁴

58. 来自个人和住户的私人跨界转账也大幅增长。据估计，2013 年，移民将约 4 040 亿美元汇往发展中国家，比 1990 年记载的汇款量增长了 10 倍多，当时的汇款估计值不到 400 亿美元。³⁵ 此外，2013 年，个人、基金会和其他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慈善资助约为 600 亿美元，大多数捐款来自发达国家的私人捐助者。³⁶ 慈善行动者尤其热衷参与全球部门基金，如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59. 一些国家将国际资本流入的一部分用于建立外汇储备，部分用作抵御国际资本流动波动影响的一种自我保险形式。外汇储备从 2000 年的 2.1 万亿美元增至 2013 年的 11.7 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拥有近 8 万亿美元，前五大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其中 65% 的外汇储备。³⁷

³¹ 数据为三年平均数，依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计算，见 [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2014年8月8日查阅))(2014 年 8 月 8 日查阅)。

³² 贸发会议，《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4.II.D.1)。

³³ 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库，可查阅 <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

³⁴ LPL Financial Research, Weekly Market Commentary, 6 August 2012。可查阅 <http://moneymattersblog.com/login/login/wp-content/uploads/2012/08/WMC080712.pdf>。

³⁵ 移徙和汇款问题工作队，发展前景小组，“移徙和汇款：最新发展情况和展望”，移徙和发展简报第 22 期(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1 年移徙和汇款概况》第二版(2014 年，华盛顿特区)。

³⁶ Hudson Institute, “The Index of Global Philanthropy and Remittances” (Washington, D.C., 2013)。

³⁷ 数据基于基金组织第四条报告和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五. 战略方法

60. 图四显示了用于指导制定可持续发展融资战略的分析框架。资金来源可分为四类：国内公共部门、国内私人部门、国际公共部门和国际私人部门。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引导和激励更多这种多样且分散的资金来源为可持续发展所需投资提供资金。

61. 正如图四所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融资决定都受到国家政策框架和国际金融结构、适当和有效的融资机构的规模以及用于推动和帮助克服可持续发展投资障碍的工具开发和制定的影响。本着这一精神，委员会的战略方法由以下规则来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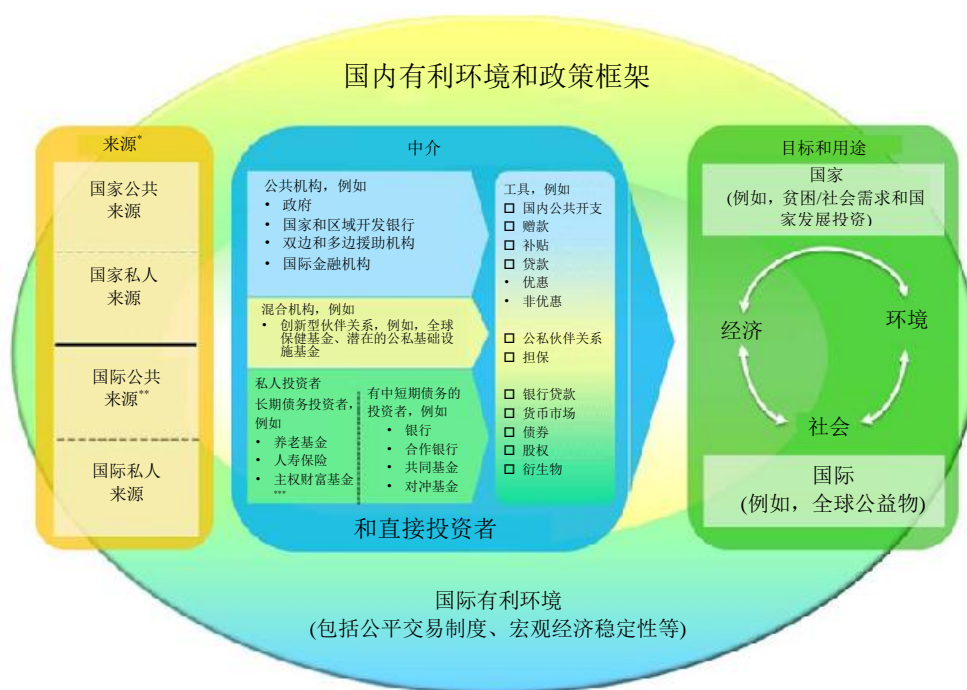
1. 在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确保国家所有权和领导权以及有利的国际环境。每个国家对其自身发展负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执行要在国家一级实现。但是，各国所做的努力需要有必要的国际公共支助和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补充。
2. 采用有效的政府政策是可持续发展融资战略的关键。所有融资行为都是在为所有行为者设定规则、规章和激励措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完成的。因此，有效的体制和政策以及善治，是高效利用资源和释放可持续发展额外资源的核心。
3. 以全盘方式利用所有的资金流。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融资需求，要求对所有资金流(包括公共、私人、国内和国际)的贡献进行优化。依据不同的任务授权和潜在的激励措施，每类融资方式都有具体特点和优势。至关重要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增效作用，利用互补优势，立足于所有融资来源的最佳互动。
4. 使融资流与适当的需求和用途相协调。不同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和项目特点要求不同类型的公共、私人 and 混合融资。虽然私人融资至关重要，但私人供资不尽相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投资应由长期资金供资。
5. 尽可能扩大国际公共融资的影响。对于需求最多且筹资能力最差的国家而言，官方发展援助起到关键作用。融资工具及其减让性的应用应与各国发展水平、具体国情、能力和潜力以及项目性质相适应。
6. 将可持续发展标准纳入国家融资战略的主流。融资应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这需要有政策和激励措施，以将可持续发展纳入融资战略和执行方法。可持续发展标准应酌情列入公共预算和私人投资决策中。
7. 利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常常相互重叠。融资应以利用协同增效作用和支持可持续发展

展政策的连贯性为目的，同时考虑到潜在的利弊。因此，融资工具可用来同时达到几个政策目标。最好是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内进行协调。

8. 采用多方利益攸关方的、以人为本的包容办法，以在实地取得具体成果。与包括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协商，将使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各级可持续发展政策时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们的不同需求和关切。在这方面，必须确保性别平等和对土著人民及残疾人等边缘群体的包容。

9. 确保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融资透明度。透明度和问责制必须成为所有融资行为的支撑，以提高其合法性和实效。提供援助的政府和伙伴国家应争取更加协调连贯的相互问责制，改善数据收集和加强监测，同时确保国家所有权。应更加高效、透明地对私人资金流进行监测。

图四
国际和国家融资来源提供给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流*



* 方框的大小不代表融资规模/重要性。

** 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公共融资也直接支持国际目标的执行。

*** 主权财富基金负责处置公共资金，但管理方式与私人投资者相同。

六. 可持续发展综合融资战略的选择

62. 各类融资的决策是由不同机构和行为者分散做出的。本质上讲，国内和国际私营部门的供资决定由多方行为者分别做出，尽管在协调方面做出努力，但国际公共融资的交付也高度分散。因此，基于国家所有权原则统一融资战略，对于促进多种融资渠道的协调必不可少。鉴于融资战略包含贯穿各领域的层面，有必要对国家决策进行协调。各国政府还应就其战略框架进行有效宣传。

63. 在下文中，委员会将重点介绍与四种融资来源以及混合融资有关的具体政策领域，并提出政策选择和金融工具的工具包，在协调一致的国内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使用。尽管下文提出的建议多种多样，但应根据国内政治因素和其他具体国情来选择具体的政策措施。

A. 国内公共融资

64. 国内公共融资有三个主要作用：(a) 提高公平性，包括通过减贫；(b) 提供市场回避的或提供不足的公益货物和服务，制定政策以改变私人行为者的激励机制；以及(c) 维持宏观经济稳定。³⁸ 此外，国内资源调动巩固了国家对公共政策的所有权，使各国能够推进融资自主权。国家公共融资战略应体现这些激励措施，因为它们引导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执行。

促进税制改革、税务合规和深化国际合作

65. 国内资源调动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税基规模、国家税收征管能力、税收弹性、被征税部门的波动性和商品价格。虽然优化的税收政策设计必然体现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但政府应遵循健全公共财政管理的公认原则，例如税收制度应当公平、高效和透明。政府还应通过累进税政策(如所得税抵免)和对基本货物和服务的增值税减免，将收入分配底部的实际收入收益作为优先事项。更笼统地说，在保持公平和效率的同时，税基应尽可能宽泛。事实上，拓宽税基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收税方面在近期取得了进展。税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指标包括高级别政治承诺、行政和政策改革以及税收管理方面的强有力领导。³⁹ 可能有必要对一些公共服务收取社会平衡用户费，以便受益人分担服务成本，但不鼓励对基本社会服务收费。

66. 但是，个别政府仅靠自身在全球化经济中能够取得的成果有限。例如，国家管辖权有时通过提供税收激励政策与其他国家竞争，以吸引和留住雇主，此举削弱了竞争国家双方的税基。终结有害的税收竞争需要竞争国家之间开展合作，同

³⁸ Richard Musgrav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A study in public economy*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³⁹ 基金组织、经合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支持建设更有效的税收制度”，向 20 国集团发展工作组提交的报告(2011 年)，见 www.imf.org/external/np/g20/pdf/110311.pdf。

时尊重各国拟订本国税收制度的主权权利。这通常在区域或国际论坛上进行。这种论坛也鼓励合作以遏制非法资金的流动，第七章对此进行了讨论。⁴⁰

67. 然而，迄今为止，对税收和海关部门的技术援助只占官方发展援助的极小份额。³⁹ 展望未来，应更加侧重于响应国家对加强财政管理能力和国内资源调动能力建设的要求。此外，成功的改革实例可激发其他地方的政策拟订。关于税务合作更广泛的国际论坛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见第七节)。额外的能力建设工作应针对从采掘业征收足够税收的体制能力。

68. 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自然资源管理尤为重要。管理采掘业的财政规则应确保公众利益得到适当补偿。政府也可以拟订政策确保将资源收入的一定份额储存起来，并投资于子孙后代的利益，如投向主权财富基金。来自资源采掘的税收收入具有波动性，政府可以通过商品稳定基金在资源价格高的年份累积收入盈余，在资源价格低的年份平缓政府支出。有必要开展国际合作，以对付非法贩运自然资源行为，包括从处于冲突局势的国家非法贩运资源。在许多情况下，透明度和反腐败方案，包括自愿倡议，也十分重要。

确保良好的财政治理和公共财政管理

69. 在改善国内收入动员方面，打击腐败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腐败会对企业、个人和公共财政管理产生不利影响。腐败指数得分高也与公共收入低密切相关。为了推进反腐败斗争，各国应争取批准和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应做出进一步综合努力，特别是在预防、执法和被盗资产追回方面(见第七节 C 小节)。

70. 良好财政治理的核心要素是适当规划和执行预算。公认的良好预算编制原则涵盖制定、批准、执行和审计阶段。这些原则应确保公共开支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环境、社会、经济、性别和其他目标包括在内。规划和执行预算应以透明度、合法性、问责制和公民参与为基础，并符合国力和国情。在这方面，应执行和加强用以确保开支符合预期目的的国内公共部门内部和外部控制机制，如最高审计机构。此外，财政分权可加强地方治理并创造地方对资金配置的所有权。

71. 在标准化预算政策的讨论中询问是否会继续保证特殊补贴是正常的。各国应审查所有补贴的效力，将其作为健全财政管理的一个事项。各国应考虑根据国情，通过消除市场扭曲，精简鼓励浪费性消费的低效化石燃料补贴，可采取的手段包括进行税制改革和逐步淘汰这些有害补贴(如有的话)以反映其环境影响。这种行动应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和国情，并以保护穷人和受影响社区的方式尽量减少可能会对其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⁴¹

⁴⁰ 虽然没有商定非法流动的定义，但在本报告中，将其定义为非法获得、利用以及不论在何种情况下，跨界转移的资金，包括对税务部门隐瞒的利润。

⁴¹ 若干会员国表示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第 225 段有所保留(见 A/66/PV.123)。

72. 同样，各国应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业市场的贸易限制和扭曲，包括根据多哈发展回合的规定，取消各种形式的出口补贴和具有同等效果的所有出口措施。

73. 许多国家的采购制度需要进一步加强，以确保公平竞争。作为预算执行的一部分，主管当局不妨使其采购政策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相一致，这意味着为公共部门供应商规定最低限度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同时考虑到国内情况。在这方面，可持续采购可能具有额外益处，可促进可持续技术。公共采购制度还可以促进地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74. 应根据国力和国情，监测和评价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以此方式来补充财政审计和财政控制。可指派更强的国家和独立审计和评价机构承担这一职责，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其他固定监管机制，如议会中的机制也可承担这一职责。包括知识和经验交流在内的能力发展倡议有助于改善政策拟订、预算过程和预算执行。

内化外部效应和将环境可持续性纳入主流

75. 在促进环境可持续性方面，财政改革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上限与交易”和碳税等政策措施试图通过提高碳排放价格和“外部效应的内化”来遏制碳排放。但是，碳市场仍然较小，仅涵盖全球排放量的 7%。⁴² 此外，排放许可交易价格过低且不稳定，不足以影响清洁技术的开发和部署。设立了“上限与交易”计划的国家政府需要设置足够严苛的上限，监测波动并制定适当规章。同时，13 个国家开始在国家或国家以下各级征收某种形式的碳税。⁴³ 虽然对于碳排放征税是否会影响竞争力这一问题还存在一些争论，但一些欧洲国家已执行碳税政策超过十年，这种政策对其国内生产总值具有中立和略为积极的作用。⁴⁴

76. 政府也应考虑其他政策以改变投资模式，如直接设定与投资有关的排放限制、补贴清洁技术(包括碳固定和碳封存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税收激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能源效率或可再生能源目标、污染权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77. 环境核算合并了自然资源使用方面与环境有关的资金流和账户，是可帮助政策制定者内化外部效应的另一种机制。国内生产总值是政府用来评估国家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衡量标准，但是，如果不计入自然资本，就会导致政府忽视投资配置效率低的问题。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领域更多的公共投资。

⁴² Climate Economics Chair, *Climate Economics in Progress 2013* (Paris, Dauphine University, 2013)。

⁴³ 世界银行，《2014 年碳定价状况和趋势》(2014 年，华盛顿特区)。

⁴⁴ David C. Mowery, Richard R. Nelson and Ben R. Martin, “Technology policy and global warming: Why new policy models are needed (or why putting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won’t work)”, *Research Policy*, vol. 39, No. 8 (October 2010)。

解决不平等和社会保障要求

78. 各国政府应利用财政政策(包括税收和开支)来解决不平等、消除贫困、改善水和卫生设施,并支助其他社会服务,特别是有利于低收入、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服务。时常呼吁将“扶贫”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公共投资项目作为优先事项。

79. 结构性脆弱影响了穷人和其他受社会排斥的群体、妇女、残疾人、土著人民、移徙者、少数群体、儿童、老年人、青少年和其他弱势群体,可通过努力普遍供应基本社会服务来减少结构性脆弱。⁴⁵

80. 除了提供抵御风险的保护措施外,社会保护可通过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增进社会稳定,促进公平增长。各国应考虑制定政策以加强“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结果,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收入能够负担得起这一标准,但需要国际援助来支助最贫穷的人。⁴⁶ 保险服务提供更多机会以创建家庭安全网,例如,包括涵盖保健、生命风险和农业的保险产品。但是,私人保险通常无法有效覆盖那些最需要的人,因此,政府政策仍然至关重要。还迫切需要政府适当投资于减轻灾害风险和增强应对冲击的复原力的系统,也需要投资于环境保护,特别是在当地居民依赖自然资源的地区。

81. 生产性和体面就业是收入保障的最重要形式。大多数人依赖工作报酬,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是减贫和增进公平的核心。

有效管理公债

82. 债务资金筹措体现了一种可行选择,可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公共开支提供资金。同时,需要有效管理债务,旨在确保在多种情况下可偿付债务责任,各国政府应定期利用分析工具,评估替代性借款战略和相关风险,更好地管理其资产和负债,以及杜绝不负责任的借贷。财务部门应着眼于增加以当地货币发行的长期债券,特别针对国内投资者,因为这种保障将减少政府的外汇风险。同时,如《蒙特雷共识》中达成的协议,债权人与主权债务人分担责任,防止和解决债务危机,包括适时提供债务减免。他们有责任充分评估信贷风险,改进信用调查和减少不负责任地贷款给高风险国家。

83. 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系统一直在为审慎管理政府债务制定标准。已达到较高债务水平的国家需要确保公共债务的增长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增长,以

⁴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保持人类进步——减少脆弱性和建立复原力(2014年,纽约)》。

⁴⁶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为实现公平和包容的全球化而实施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咨询小组的报告》(国际劳工局,2011年,日内瓦)。

免发生资金困扰。在这方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旨在通过设置债务阈值，帮助指导低收入国家及其捐助方调动融资同时减少债务过度积累的可能性。此外，国际机构正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这一领域的地方能力。应当坚持此举，并履行转让资金、技术和能力的承诺，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建立人力和机构能力，从而有效管理公债(见第七节关于系统性和主权债务解决的讨论)。

探索国家开发银行的潜在贡献

84. 在私营部门未对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长期融资和投资的情况下，许多国家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公共机构以支助长期投资。由20个国家、双边和区域开发银行组成了国际发展融资俱乐部，其2010年的联合资产总额超过2.1万亿美元。⁴⁷ 国家开发银行在资助中小型企业、基础设施和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国家开发银行对国内市场具有具体认识，它们往往适合为私人项目管理提供相关能力发展和援助。最近的研究还表明，一些国内开发银行也起到了重要的反周期作用，尤其是在私营部门实体成为高风险规避者的危机发生的情况下。

85. 政府可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加强资本市场和影响可持续发展投资。例如，一些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发行债券资助其(部分)活动，分配所筹集资金用于特殊用途，如将绿色基础设施的收入分配给特定投资类别(例如绿色债券)。

86. 但是，政策制定者在国家开发银行方面遇到挑战。他们应当确保公共开发银行不承担私营部门具有竞争力的活动。重要的是，应出台规定以避免对银行运营施加不当的政治干预，并确保高效利用资源，特别是在促进私营部门投资于可持续发展方面。

B. 国内私人融资

87. 为了解私营部门在可持续发展融资中的作用，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私营部门包括不同的参与者，从住户到跨国公司，从直接投资者到银行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私人资源历来是国内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驱动因素。

88. 私人融资以营利为导向，这使其特别适合生产性投资。然而，投资质量也很关键。目前，虽然私营部门越来越认识到，可以同时实现商业利益和公共政策目标，但仍然缺乏针对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必要国内投资。

89. 因此，政府的职责是，制定政策，帮助激励更多地为可持续发展长期投资。对减少风险和鼓励私人投资而言，有利的环境必不可少。此外，政府可以在健全的监管框架内努力发展针对长期投资的地方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

⁴⁷ 见 www.idfc.org/。

为住户和微型企业提供获得金融服务渠道

90. 最近的研究表明，稳定、包容和高效的金融市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活动和改善其他社会福利的交付，特别是针对妇女的福利，具有改善民生的潜力。⁴⁸ 要想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扩大提供给穷人、老年人、妇女、残疾人、土著人民和其他得不到充分服务的人口的金融服务范围和规模。

91. 所有收入水平的住户(即使是最贫穷的住户)都使用基本金融服务，即支付、储蓄、信贷和保险。穷人，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穷人主要使用非正规的金融服务提供商。事实上，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工作年龄成年人无正规金融服务提供商的银行账户，其中绝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⁴⁹ 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能够就近提供价格合理且适当的金融服务，人们会使用这些服务。⁵⁰ 因此，许多政府提供和(或)欢迎面向穷人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包括小额金融机构、合作银行、邮政银行和储蓄银行以及商业银行。

92. 各国落实金融包容性的最佳方式各不相同。然而，一些要素在各个国家均行之有效，包括支持信用部门的发展以评估借款人的贷款承受能力。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使穷人能够获得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无需长途跋涉前往银行分行。无网点银行和移动银行技术可用于减少政府支付给人民的款项(工资、退休金和社会福利金)的行政成本，并减少泄漏。将更多的人引入正规金融部门，也被认为对税收产生有益影响。此外，监管对于确保负责任的数字金融和避免滥用行为至关重要。

93. 调查显示，缺乏对金融产品和机构的认识阻碍其利用，特别是对保险而言。公共部门能够促进增强包括金融知识在内的金融能力，同时扩大消费者保护。特别是，应要求金融服务提供商以清晰易懂，最好是以统一的形式披露关键信息。政策制定者也应制定明确标准以公平和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消费者，以及设立统一的资源机制以有效解决整个行业的纠纷。在这方面，政府可设立消费者保护机构，以在国家范围内监督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必要框架。

94. 虽然小额金融仅是金融包容性的一个方面，但该方面受到极大的关注。公共和非营利小额金融部门内存在广泛的全球论坛网络和国际支助网络。然而，在许多国家，小额金融仍处于监管框架之外。随着小额金融机构的发展，管理者和监管者应当关注有必要在扩大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与管理风险(包括住户负债的社会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⁴⁸ Robert Cull, Tilman Ehrbeck and Nina Holle,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 Recent Impact Evidence”, Focus Note No. 92(Washington, D.C.,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CGAP), April 2014)。

⁴⁹ Asli Demirguc-Kunt and Leora Klapper, “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 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02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2)。

⁵⁰ 《通过建立包容性金融部门促进发展》(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E.06.II.A.3)。

促进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95. 获得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处指信贷)与中小企业的相关性不大,在许多国家,获得金融服务是创新、就业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全世界超过 2 亿家此类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在通常情况下,对于传统贷款人和小额信贷机构来说,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过大,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强度、缺乏信息和信用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型银行往往忽略这个市场。通过提供信用信息,信用注册部门/管理部门以及担保和破产制度将有助于扩大中小企业获得信贷的机会。

96. 长期债券市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到限制,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基金等其他为新开办的创新性企业融资的办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国家开发银行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支持中小企业获得更多资金,也可利用私人 and 公共银行特定的相互作用。例如,开发银行使用的一种模式是为商业银行部门提供减让性公共资金,商业银行以优惠利率将资金借给此类企业。工具可能涵盖担保、贷款利率补贴、股票和与股票挂钩的投资以及获取服务和信息。许多国家还为中小企业提供其他形式的支助,如政府低息贷款方案。合作银行、邮政银行和储蓄银行也非常适合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包括开发和供应更加多样化的贷款产品。

97. 由于缺乏信息以及信用风险的不确定性,许多银行认为,贷款给中小企业风险高。即使银行部门的流动性充裕,信贷通常也是不充分的。然而,中小企业贷款的多样化投资组合可以大幅降低风险。各银行可以寻求将中小企业贷款多样化投资组合证券化,以确保更加多样化,这有可能增加可贷给中小企业的资金。但是,必须落实保障措施,以应对“贷款并分配”的银行业存在的风险(该风险在金融危机期间尤为突出),以便贷款发放者在保证贷款运转期间持有股份(如有规则要求银行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保留每笔贷款的一定比例)。

发展长期投资的金融市场,增强对余额获得和稳定性的监管

98. 资金充裕的银行部门和长期债券市场使得国内企业能够满足其长期融资需求,同时不承担与外币借款有关的外汇风险。因此,在为长期可持续发展融资方面,地方债券市场可发挥重要作用。要想成功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政策制定者需要建立机构和基础设施,包括监督、清算和结算系统、有效的信用部门、保障消费者的措施以及其他相关规章。

99. 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持有长期债务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人寿保险公司、捐赠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非常适合提供长期融资(然而,近几十年来,国际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在短期内投资,见第六节 D 小节)。为培育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发展,政策制定者需要制定体制、法律和监管框架。其中包括证券法、资产管理规章和消费者保护。政策制定者可制定关于透明流程、合理管理和高效执行体系的规则。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成功监管框架的实例不胜枚举,但发展中

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使这些框架适应当地情况，且灵活地进行更新，以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

100. 一般情况下，需要谨慎发展金融市场，因为债券和股票市场往往表现出较高的波动性，缺乏流动性的小型市场尤为如此。为限制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的过度波动，可结合资本账户管理工具制订规章以阻止“热钱”。在一些地区，发展区域市场会有效地实现个别小型市场无法达到的规模和深度。新兴市场和固有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将技能、知识和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但应注意适应当地情况。

101. 另一方面，必须注意，相对于国内经济而言，金融部门有可能过度发展。金融部门增长超过一定限度，可能增加不平等和不稳定，部分原因是信贷增长过度和资产价格泡沫。⁵¹ 因此，重要的是，所有国家要拟定“宏观审慎的”强有力监管框架。

102. 强有力的监管框架应考虑金融中介的所有领域，包括影子银行，从小额金融到复杂衍生工具不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增强稳定性并降低风险，同时促进获得信贷，对其构成了复杂挑战，因为必须在两者之间权衡利弊。政策制定者应拟订监管和政策框架，以在这些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例如，欧洲联盟将特别规定(例如资本要求指令四)纳入了《巴塞尔协议三》的执行中，以降低贷款给中小型企业企业的资本成本。还呼吁对金融部门监管体系进行扩展，从注重金融稳定扩大到纳入可持续性标准。

103. 伊斯兰融资也产生了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融资的重要机制。在过去十年里，伊斯兰金融资产迅速增长，包括在基础设施融资、社会投资和绿色投资领域。⁵² 伊斯兰融资所使用的投资工具基于共同的经营风险，通过提供替代性融资渠道，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这些融资结构可能提供如何发展一类新的长期投资的经验教训。

加强有利的环境

104. 众所周知，加强国内政策、法律、规章和制度环境，是政府鼓励私人投资的有效途径。为了更好地调动和有效利用资金，政策措施应着眼于缓解国内的各种瓶颈。因为付出了这种努力，在过去十年里，许多发展中国家减少了过多的复杂事项以及企业在启动和维持运作时须支付的成本。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改革结构因历史经验、文化和政治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政策制定者能够增强合同的可执行性，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权利以及贸易和竞争政策的效力，简化商业登记

⁵¹ Stijn Claessens 和 M. Ayhan Kose, “金融危机：原因、类型和影响”，WP/13/28 号工作文件(货币基金组织，2013 年 1 月，华盛顿特区)。

⁵² 伊斯兰金融的基础原则是伊斯兰法；它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分摊收益与损失以及禁止收取和支付利息。

制度，促进法治、人权和有效保障。在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人力资本方面投资，也有助于商业环境更具吸引力。在任何国家，政治不稳定、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政策的不确定性都是开展业务的重大障碍，这更广泛地突显了稳健政策的重要性。

加强金融系统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以及可持续能力审查

105. 政策制定者应着眼于在所有机构和各级推动可持续能力审查。可通过鼓励就经济收益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影响进行联合报告(可称为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来完成审查工作。此外，适当的规章，如符合国情的投资组合要求和其他措施可用来加强这些审查。

106. 有迹象表明，一些金融市场加强了对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审查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行动者签署了针对项目融资者的赤道原则、负责任的投资原则和可持续保险原则，这些原则为私营投资者设定了标准。同样，可持续证券交易倡议旨在探讨交易所如何与投资者、监管机构和公司合作，以提高企业的透明度、报告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业绩，以及鼓励对投资采用负责任的长期办法。许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对这些倡议的了解仍然有限。因此，重要的是，要提高公共机构和金融市场企业的认识和能力建设。在这方面，政府可鼓励金融市场企业向雇员提供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培训，这可纳入资格考试和行业执照课程。

107. 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考虑因素是融资活动的排放影响。在这方面，一些养老基金，虽然规模较小，但已开始自愿基础上监测其投资组合的排放，⁵³ 使得资金管理者能够认识到其已经承担的风险。通过鼓励指数供应者加快基准拟订工作，并且鼓励排放影响的透明度，特别是在公共投资基金(例如，公共养老基金)中，政策制定者可以在这一领域中发挥推进作用。

108. 关键问题是，自愿倡议能否基本上改变融资机构做出投资决定的方式。政策制定者可考虑建立监管框架，以使一些做法具有强制性。为取得最大效果，这些政策应基于私营部门、民间社会、金融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广泛互动。在这方面，包括巴西、法国、马来西亚、南非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内的若干国家已批准了一些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国际组织可设立一个关于各类文书和协议的成败经验的分享平台。

C. 国际公共融资

109. 在资助可持续发展方面，国际公共融资发挥着核心作用。类似于国内公共融资，国际公共融资有三个功能：消除贫穷和发展；为区域和全球公益物的供应融资；在更广泛的全球有利环境中维护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见第七节)。国际公共融资应补充和推动国家在这些领域的努力，仍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中不可缺少

⁵³ 见 www.rafp.fr/download.php?file_url=IMG/pdf/PR_Carbon_Audit_ERAFP.pdf。

的要素。官方发展援助仍将尤为重要，在需求最大和筹资能力最弱的地方，应得到重视。

实现现有承诺

110. 官方发展援助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外部公共融资的重要来源。官方发展援助在 2013 年达到创纪录水平，但仅占国民总收入的 0.3%，仍然大大低于国际商定目标，即国民总收入的 0.7%。同样，尽管《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中承诺将国民总收入的 0.15% 至 0.20% 作为官方发展援助分配给最不发达国家，但分配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平均仅占国民总收入的 0.09%。²⁷

111. 2010 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各方商定，与有意义的缓解行动和透明的执行方式相联系，发达国家承诺争取达到在 2020 年之前每年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共同调动 1 000 亿美元，将通过各种渠道(公开、私人、双边、多边、包括替代资源)筹集资金。

112. 联合国会员国应充分而及时地兑现其承诺，不应忽略或淡化承诺。会员国尤其应认识到最不发达国家与其他脆弱国家存在的巨大融资差距。需要付出进一步努力，以维持和增加分配给最不发达国家和最需要资金的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

利用所有国际公共融资资源和工具

113. 一些政府共同参与制定创新机制，以调动用于发展和消除贫穷的额外的国际减让性资源。国际社会应进一步探索创新机制，以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融资(见第四节，C 小节)。

114. 根据大会第 64/222 号决议批准的联合国南南合作会议(2009 年)内罗毕成果文件，南南合作为南北合作的补充，是一类不同的且日益重要的政府间自愿援助，能够推进可持续发展。一些南方援助提供者已决定，除其他外，通过对南南合作经验进行额外的循证分析和对南南合作方案进行评价，来进一步加强其工作。此外，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通过了第 18/1(2014 年)号决定，就联合国系统提出了建议，包括请秘书长将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的具体步骤纳入其综合报告。

115. 三方合作是进一步的有益补充，通过共享知识、经验、技术和资金资源，具有改善发展合作实效的潜力。

116. 与官方发展援助，国际公共基金，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的某些贷款的减让性较低，这些基金是一些国家中长期融资的重要来源。重要的融资方式包括提供给政府的公共贷款、针对私营部门的股权和债务融资及一系列混合融资工具，包括风险缓解工具，如信用和政治风险担保、货币互惠信贷以及合并公共和资本市场资金的安排(例如，传统基础建设项目)。如果按照国家和部门需求使用，并且发挥其具体优势，这些工具能够帮

助降低风险，并调动更多前期融资(与单从预算资源中获得的融资相比而言)，这将在第六节 E 小节关于混合融资的讨论中提及。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最不发达国家不至于仅仅因为其收入而无法获得国际金融机构和开发金融机构较少的减让性资金。而是应该逐案审查财政上可行的项目，同时牢记债务可持续性因素(见图五)。

高效和有效利用国际公共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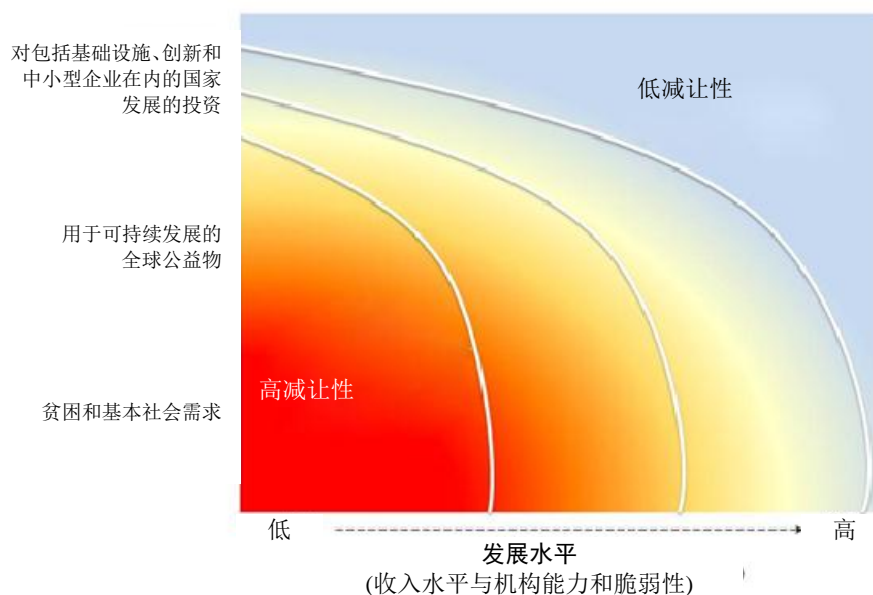
117. 国际公共融资从根本上讲是纳税人的资金，为减让性和非减让性公共金融中介高效和有效的部署增添了额外负担。官方发展援助应集中在需求最多和筹资能力最弱的地区，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应有适当比率的官方发展援助侧重于消除极端贫穷以及减少一切形式贫困和满足其他基本社会需求。

118. 在为国家发展如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方面，国际公共融资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的一些投资是盈利的，国际公共融资能够促进这些领域内可持续发展的私人融资(见关于混合融资的第六节，E 小节)。为此，在不挤占传统发展援助的情况下，国际公共融资也应应对全球公益物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

119. 委员会认识到，国际公共融资需在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多重作用，建议国际公共融资的减让程度应考虑到国家的发展水平(包括其收入水平、机构能力和脆弱性)和投资种类，如图五所示。应给予基本社会需求最高的减让幅度，包括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适当融资。在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许多全球公益物融资方面，减让性融资也至关重要。对于一些国家发展投资来说，贷款融资工具可能更合适，特别是当投资可能产生经济回报时。

120. 多年来，国际社会议程上一直有一个承诺，即，通过加强获得官方发展援助的国家与其捐助方之间的伙伴关系的相互问责，提高发展合作实效。除其他外，这是 2007 年成立的联合国发展合作论坛关切的一个事项。通过其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定期对话和政策分析，该论坛提供了关于如何更有效管理促进发展的国际金融和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指导。在罗马(2003 年)、巴黎(2005 年)、阿克拉(2008 年)和大韩民国釜山(2011 年)举行的四次援助实效高级别论坛进一步强调了追求实效，促成建立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2014 年 4 月在墨西哥城举行了该伙伴关系的第一次高级别会议。

图五
按国家发展水平和不同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分列的国际公共融资指标性目标



122. 为了减少环境和气候融资的碎片化和复杂性，尤其需要切实实现总体结构合理化。在气候融资领域，气候公约缔约方同意设立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公约》第 11 条下资金机制的经营实体。该基金将充当多边工具，各国政府和其他资金提供者可通过该基金输送赠款和减让性贷款资源，以支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方案、政策和其他活动。⁵⁴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商定，新的气候变化多边适应资金的很大部分将通过绿色气候基金提供。

123. 同时，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融资战略的一部分，合作伙伴的能力需得到加强，以便更好地管理来自不同提供者的援助。各国应共同创立和使用便利化平台，以鼓励国际基金与倡议之间的业务协调。包括环境基金在内的基金和方案需支持国家和地方两级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应修改现有的基金和工具规则，以确保以协同增效方式涵盖所有相关活动。

⁵⁴ 见 GCF/B.07/11 号文件。

D. 国际私人融资

124. 与国内私人融资类似，国际私人融资包含大量资本流动，包括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流动和跨界银行贷款。其中部分资本流动与下文讨论的公共财政融合在一起(第六节，E节)。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国际机构投资者持有估计80万亿至90万亿美元资产，是巨大的潜在投资来源。然而，迄今为止，它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投资一直较低。例如，养恤基金仅将其全球资产的3%投资于基础设施。⁵⁵ 这突显出在新增公共开支的共同作用下政府政策必须帮助克服私人投资的障碍。因此，在国内私人资金(第六节，B小节)项下讨论的诸多问题也适用于此处，但本节侧重于具体涉及跨界投资的问题。

将国际资金用于可持续发展长期投资

125. 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最稳定、最长期的私人外国投资来源，在为可持续发展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政策制定者必须监测外国直接投资的质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各国政府应酌情采取政策，鼓励跨国企业与地方生产活动建立联系，支持技术转让，为地方工人提供继续教育机会，以及增强地方产业有效吸收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尊重《全球契约》或其他国际社会和环境标准中所述的人权原则、劳工、环境和反腐败价值观的企业可为其他企业树立典范。同时，东道国政府应要求所有企业，包括外国投资者，达到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动标准，并鼓励提交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使可持续发展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26. 正如关于国内投资的第六节B小节所讨论的，投资者不可能对那些他们存有政策或监管机制忧虑的国家进行长期投资，这突显了有力环境的重要性。此外，投资者通常指出，投资的主要障碍是缺乏“银行肯担保的项目”，难以同其他投资机遇竞争，这强调了许多国家需要培养项目筹备方面的能力。

127. 同时，投资者——包括养恤基金、人寿保险公司及主权财富基金等长期债务——在投资于广泛的政策和监管机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项目方面表现得踌躇不决。⁵⁵ 一个障碍是，许多投资者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去克尽必要的职责，以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或其他长期资产。相反，当他们做这些投资时，他们都是通过金融中介完成的，而金融中介的债务和激励机制倾向于短期性质(有关长期和短期投资者的细分见图四)。⁵⁶ 如果长期投资者要绕过中介直接投资，他们可以在其投资决策中采取一种长限投资。但是，不同的投资者在内部培养这种专长通常不具备成本效益。因此，该领域需要新的手段。例如，投资群体可打造联合平台，如可持续基础建设投资。这已经开始成为现实(例如南非养恤基金建立了共同拥有的

⁵⁵ 见联合国系统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工作组，背景文件 3。

⁵⁶ 尽管许多基金经理在机构内部管理流动性更强的投资组合，但大多数投资者利用外部经理人进行此类投资(见联合国系统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工作组，背景文件 3)。

基础设施基金)。正如第六节E小节关于混合融资所讨论的那样, 多边和双边开发金融机构等公共行为者也可帮助建立投资平台。

128. 此外, 可制定相应政策以延长投资期限, 如通过减少使用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制度, 实现长期投资(其中的投资组合估算每日调整, 因此给投资组合带来短期的不稳定性), 以及除其他外, 改变业绩计量和赔偿标准(以改变奖励办法, 并有可能纳入可持续标准)。

管理与短期的跨界资本流动相关的风险的不稳定性

129. 虽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流在过去十年有所上升, 但一些类型的流入仍然高度不稳定。管理跨国资本流动不稳定性的常规方法侧重于宏观经济政策, 以加强经济体吸纳流入资金的能力。但这些政策稳定资金流动的针对性可能不那么充分, 而且可能出现意外的副作用。因此, 政策制定者应当考虑用一套工具来管理资本流入, 包括宏观审慎的资本市场监管以及直接的资本账户管理。⁵⁷

130. 此外,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以及全球流动性的管理可降低全球风险。同样, 更密切的区域合作和对话以及区域经济和金融监测机制可帮助稳定区域一级的私人资本流入。

促进汇款及私人发展援助的流动

131. 移民汇款是流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流的重要来源。但是, 汇款与其他资金流存在本质区别, 它代表的是一种私人交易且往往基于家庭或社会关系。汇款可使住户增加教育、保健和住房领域的消费和投资。⁵⁸ 政策制定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应探讨创新性办法, 包括通过发放散居债券, 以激励将汇款投资于生产活动方面。

132. 但是, 汇款成本仍然奇高, 为转账金额的8.4%。⁵⁹ 汇出国与接收国之间加强合作, 应瞄准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及减少汇款壁垒。二十国集团降低汇款成本倡议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 应予以继续和加强。但是, 某些证据也表明, 国际银行正减少其在该领域的作用,⁶⁰ 这是为应对洗钱对银行进行更严密监控的一种意外后果。需要制定政策措施, 确保竞争和监控成本。

⁵⁷ Joseph Stiglitz and others, *Stability with Growth: Macroeconomics, 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⁵⁸ Ralph Chami and Connel Fullenkamp, “Beyond the Househol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50, No. 3 (September 2013)。

⁵⁹ 移民和汇款问题工作队, 发展前景小组, “移民和汇款: 最新发展情况和展望”, 移民和发展简报第 22 期(世界银行, 2014 年, 华盛顿特区)。

⁶⁰ Michael Corkery, “Banks Curtailing Cash Transfers”, *New York Times*, 7 July 2014。

133. 慈善活动，即，基金会、公民个人和其他非政府行为者的自愿活动，也在范围、规模和复杂程度方面大幅拓展。它尤其为全球保健基金提供了重要资源(见第六节，C小节)。除资金外，慈善活动还提供智力资本、技术能力及丰富的经验。关于慈善资金流动的更好数据能够帮助更好地评估其影响，改善协调并帮助简化融资、减少重复，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最大化。

E. 混合融资

134. 政策制定者最近对一种吸纳公共和私人资源及专长的名为“混合融资”的发展融资机遇表现出极大兴趣。混合融资涵盖潜在融资工具组成的大型投资组合，这些工具包括开发金融机构提供的旨在利用私人资金的工具(例如，贷款、股票投资、担保等)以及传统的公私伙伴关系(见下文表1)。但这种融资不会超越这些构架将结构性公私基金以及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包括政府、民间社会、慈善机构、开发银行及私人盈利机构——之间创新的“执行伙伴关系”纳入其中。一旦制定完善，混合融资允许政府利用掺入私人资本的官方基金，共担风险、共享回报，同时在公众关切领域继续追求国家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

135. 然而，务必要注意，那些设计不当的公私伙伴关系和其他的混合结构可能导致私人伙伴获得高回报，而公共伙伴却承担了所有风险。需要审慎考虑混合融资工具的适当使用及结构，下文将讨论这一点。

对混合融资和创新伙伴关系的使用进行战略评估

136. 当一个项目或投资的总体收益足够大，即便在补偿私人伙伴后，公共部门仍可获得可观收益，则混合融资可成为有用的融资工具。混合融资可用于基础设施和创新等广泛领域。混合融资尤其适用于推动那些刚好处于实际中或理论上商业可维持能力差数以下的投资，且这些投资不能单凭某项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获得释放，但同样服务于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公共和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部门之间的混合融资不太适合促进对基本发展需求的供资，此类需求带不来经济回报。

137. 混合融资项目应该是透明的并可以问责。应该通过公开、公平的进程选择项目的参与方。为进一步增强其持续发展影响，项目设计阶段应处理好贫穷、环境及性别方面。

138. 在实施混合融资项目时，应审慎评估项目成本。在发展中国家，私人投资者通常要求“银行肯担保的项目”最高20%到25%的年回报率。这些成本需要通过增效或其他收益来抵消，以使其用途具有吸引力。此外，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项目往往难以按照既定计划来实现，发达国家的公私伙伴关系，由于延迟、成本超支及其他因素，失败率达到25%到35%，⁶¹ 发展中国家的失败率

⁶¹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xternal Policies of the Uni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post-2015: Improving the Contribution of Private Finance” (Brussels, European Union, 2014)。

则更高。因此，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在参与混合融资结构时需要审慎规划、设计和管理，以实现经济回报与非经济回报之间的平衡，并确保公民获得公正回报。需要具备超强的能力来设计切实可行的、公平分担风险与回报的融资结构。在这方面，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可在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方面发挥一定作用。

139. 应避免参与筒仓式管理的孤立的公私伙伴关系。投资公共实体应同时实施许多项目，由此采取一种投资组合办法为多个项目募集资金，这类似于开发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采取的风险分散做法。通过这种办法，伴以股权升值的机制将从成功的投资中获得收益，以弥补失败项目的损失。这特别适合在创新方面投资，此类投资的风险和回报都非常高。

表 1
混合融资工具

类别	说明	实例	普及程度
贷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多数符合官方发展援助条件的双边贷款由一国政府向另一国政府提供,用于在经济基础设施以及水和卫生基础设施方面投资,并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 开发金融机构也向私营部门提供直接贷款。尽管许多此类机构以低于商业收益率的标准运作,但它们的多数活动不符合官方发展援助的条件。 		高
直接市场干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捐助方通过赠款或股权投资,直接向私营部门转让资源 	可行性差额供资 捐助资金以使投资具有商业可行性 挑战基金和创新企业 旨在为创新项目提供资金以及支持证明已成功的项目扩大规模的竞争过程 股权 转让资源以获得股权 首亏损供资 通常被指定为从属股权的供资	低 中 低/中 低
基于风险的工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捐助方承担与私营部门或伙伴政府活动有关的一部分风险。通过该办法获得信贷,或降低信贷成本。 	信用担保 保护金融机构免遭违约侵害的规定 政治风险保险 针对选定(很少但很昂贵)的政策导向型风险提供保护	低 低
基于业绩的工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政府或捐助方在预先设定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向私营部门转让资源的未来承诺 在兑现成果(而非产出)方面为私营部门提供灵活性,并可在需要大笔的私营部门前期投资时,推动按照付款时间表兑现政府的承诺等 	预先市场承诺 事前承诺对供应品进行公共采购 社会或发展影响债券 视情况与特定投资方缔结合同,以在交付基于影响的成果后进行偿付	试点 试点

类别	说明	实例	普及程度
公私伙伴关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与私营部门基于工具组合或协商成果的合作模式• 除使用所列的融资工具外，要求进行其他投入(如经验、技术专长和银行肯担保的项目)• 捐助方可通过以下方式推动公私伙伴关系：<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提供技术援助和(或)项目筹备过程，促进向政府和私营部门提供支持○ 指示多边机构加强其推动公私伙伴关系的努力○ 提供其他的金融激励措施，以使公私伙伴关系更具吸引力		中

140. 此外，已为资助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全球公益物制定了创新型伙伴关系。例如，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它集合了慈善事业、传统的公共部门以及创新型融资，并进一步使用创新型监管构架和分配机制，以提供针对性援助。

探讨开发金融机构为支持混合融资可做出的潜在贡献

141. 不管是多边还是双边的，开发金融机构都能在混合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开发金融机构应继续努力，优化其国际收支表，并充分利用其承担风险的能力，包括通过使用优惠/混合贷款、股权、担保以及非优惠性融资和创新工具在内的所有工具。如果这些工具用于克服现有的金融壁垒，它们对用于可持续发展的私人资金的调集和利用将产生巨大影响。

142. 正如关于私人国际融资的第六节 D 小节所讨论的，在直接投资存在障碍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创新及中小型企业领域，需要制定新的融资结构，以更好地公摊和分担投资风险，同时提高公共融资。此类平台可以是国家一级的或全球一级的。在国家一级，联合王国近期建立了养恤金基础设施平台，促进英国养恤金对联合王国财政部支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同样，法国的“信托局”已将存放在特定储蓄账户中的住户储蓄转用于资助社会住房项目以及当地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

143. 除募集资金外，上述各类平台还在投资者与政府之间分享专长和知识，并帮助克服一些妨碍直接投资的信息限制。其他国家可考虑在现有的开发金融机构和(或)单独的平台或国家基金内建立类似的平台。此外，信誉评分高的实体也可发行长期(约 20-30 年)债券融资，以利用此类构架，此举将促进无法直接投资的长期基金的投资。同样，世界银行正建立全球基础设施融资机制，该机制寻求调集额外资源，并利用此类资源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通过采取配套措施加强政策和监管环境，以及提高项目质量。非洲开发银行启动了非洲 50 基础设施基金。

加强能力发展努力

144. 混合融资估值和合同尤为复杂，在设计、谈判和执行方面需要大量的公共部门能力。公共机构需要建立并培养相应的专长和能力，这正是官方发展援助可做出重大贡献的地方。项目筹备资金也需要相应增加。筹备扎实的可行性研究，对于此类机制成功的成本计算、结构建立和兑现至关重要，多边和双边开发金融机构可对此提供支持。能力建设努力应侧重于可行性研究、复杂合同的谈判以及伙伴关系活动的专业管理。但是，相关努力应着眼于培养当地技能和能力，而不是专门侧重于具体项目。还应创造适当的有利环境。国际发展行动者和各国政府可建立政策对话，以打造一个知识库和“技能库”，并就国家、区域和(或)全球一级的混合融资分享信息和经验教训。加强与投资者、银行家和公司的合作及对话也很有必要。

七. 实现融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

145. 为调集上一节所详述的融资，并促进这些融资依据国家优先事项而有效使用，有必要营造适足的国际有利环境和政策构架，为有效执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必要的政策空间。这要求世界贸易和投资体制开放且充满活力，该体制应平等对待所有国家，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同时遵守社会和环境标准。一种可减少国际公共财政(包括环境金融)碎片化和复杂性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将确保现有资金适度资本化，以及国际公共基金规则简化和协调(见第六节，C 小节)。它可以拓展创新融资，特别是全球公益物创新融资方面的国际合作。有利的国际环境包括积极的全球合作，以消除国际金融动荡的根源，同时力争减少全球金融脆弱性。其他行动包括：完成当前的开发银行及基金组织的改革进程，深化税收及非法流入方面的国际合作，监管银行及影子银行系统，以及强化相关手段合作解决主权债务困难。总之，它包含加强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

加强系统一致性及全球经济治理

146. 全球经济环境由单独的、有时缺乏协调的国际机构监督。联合国有能力充当全球论坛，在不干涉其各自任务授权和治理进程的情况下将各专门的国际机构和当局集合在一起，以体现其现有的任务授权。还有必要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各融资框架的一致性，相关框架由发展辩论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关于发展融资的雷特蒙会议后和在里约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大会后执行办法——发展而来。更广义上看，需要加强现行各国际机制、框架及工具的整合和协调，包括通过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同时尽可能避免新支持工具的激增。

147. 国际组织的效率和合法性也应得到进一步增强。包括世界银行和其他开发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全球环境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等专门机制有可能增加对可持续发展融资的调集和使用，并有可能促进各自授权范围内的相互学习和知识共享。它们也完全能够大幅拓展风险共担工具的使用。重要的是，国际金融机构要继续采取措施，使其自身的商业做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储备金募集及贸易便利机制等其他提议倡议也可发挥相应作用。国际社会将从此类试验和创新中受益。

148. 此外，为改进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进程、工作方式和优先事项，并使其更加民主和具有代表性，有必要对其治理机制进行进一步评估。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在努力进一步整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并体现它们在全球金融和发展领域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些努力应该见到成效。

149. 联合国的规范、分析和业务活动也应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得到更好的协调。联合国系统应加大努力，充分落实关于四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的大会第 67/226 号决议的规定，并在采取“一体行动”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总的来说，

重要的是，在现行体制框架内鼓励灵活性、效率、透明、问责制和创新，以促进更有效的合作与伙伴关系方式，尤其是为执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采取对可持续发展有益且公平的贸易和投资规则

150. 在全球化世界里，各经济体寻求从具有活力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中获益。国际贸易由多边商定的系统监督，该系统追求普遍、基于规则、开放、一视同仁及平等。同时，有许多双边和区域协定为贸易和国际投资设定了额外规则。

151. 多年来，关于加强国际贸易规则的全球谈判一直受到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第九次部级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编制了推动多边贸易议程的一揽子协定(包括一份贸易便利化协定和关于农业、发展及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的一系列决定)，但仍然存在的分歧导致这些协定无法正式通过。环境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实行免税、无配额的市场准入待遇等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额外问题已被纳入多哈回合的任务范围。世贸组织各部长承诺考虑一项最终工作方案，以结束 2001 年开始的多哈回合多边谈判。现在是时候处理农业出口补贴等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表明为了全球发展就贸易自由化开展全球合作仍有可能。

152. 进一步促进最贫穷国家按照其本国的国家战略、“贸易援助倡议”以及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强化综合框架》参与国际贸易体制，尤其具有核心意义。应进一步加强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贸易便利化以及旨在将贸易纳入发展政策主流的努力。

153. 此外，全球价值链流行率提高，加强了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⁶²为使投资者权利与接受国在公益领域实施管控的主权能力更加平衡，国际社会可以酌情考虑进一步编制直接影响国内可持续发展成果领域的投资标准，并确保投资不会损害国际人权标准。

154. 总体上讲，涵盖投资问题的双边投资条约和其他贸易协定激增，使得可持续发展观纳入投资机制主流更加困难。发展中国家发现自身越来越难以驾驭一种高度分化的国际投资体制，这也有可能缩小东道国的政策空间。应为国际投资机制的多边办法探索相关措施，以便更充分地平衡投资者的优先权与其业务所在国居民的需求，以期为可持续发展采用一种更加整体的办法。

加强全球金融稳定

155. 自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暴发以来，国际社会采取了重要步骤，通过监管改革来应对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在这些努力中，按照任何新的规章制度，管理者都需要在确保国际金融体制稳定和允许充分获得资金方面达成最佳平衡。

⁶² 依据是由贸发会议为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的讨论而编写的关于贸易在可持续发展筹资方面所起作用的意见。

系统稳定对于支持增长、防止未来发生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后果的危机至关重要。但是，金融监管的意外后果也会给长期融资的可得性带来负面影响，政策制定者应加以解决。

156. 在完成和执行改革议程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对于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金融监管改革通过国际机构实施，各国政府将其推荐的规章制度纳入国家实践。尽管咨询进程已获得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监管机构的通过，但需要采取进一步举措，以加强主要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透明度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其中的适足代表性。

157. 加强国际体系应对危机的准备就绪状态同样重要。国际社会应继续审查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提供预警并迅速采取反周期行动的能力，还要为其配备适足的工具，以改善全球金融体系的复原力。

158. 特别是，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一个强化的国际安全网，可降低储存国际储备的需要。应就适度的储备规模进行额外研究，同时出台基于区域合作等的备用保险机制。

加强区域合作

159. 在调集金融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加强区域合作可发挥重要作用。除其他外，有效的区域安排可为区域公益物提供融资，促进贸易流动并吸引对基础设施等关键部门的投资。区域合作还提供在财政、金融和经济事务领域进行信息共享及同侪学习的绝佳机会。此外，近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区域金融稳定机制(如拉丁美洲储备基金或清迈多边化倡议)的新关注，此类机制将作为对抗全球危机蔓延的第一道防线。

加强税收问题的国际合作

160. 国际税收规则和国家税法与资本高度流动和多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主导地位等全球经济发展形势没有保持步调一致。各国制定本国的税收制度以满足国内需求，传统上不会与外国税收当局进行协调。这为多国企业和国际投资者创造了通过构建国际交易以利用不同国家的税收规则进行避税和逃税的机会。即便一些国家政府合作并制定双边税收条约，其条款也因伙伴的不同而不同，使得各公司可利用其中的差异为自身牟利(择拣条约)。多国企业还通过内部交易不当定价(转让不当定价)以及通过使用实体和工具定性错配等手段(混合错配)，利用国家税收政策的差异。

161. 虽然每个国家负责其本国的税收制度，但就税收政策开展国际合作应该得到加强。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将涉及基于国家的报告、物主通知、自动交换税收信息、转让定价监管、避税天堂清单及非经济报告标准等。20国集团领导人批准了经合组织《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两年期行动计划》及自动信息交流。拥有

全体会员国和合法性的联合国可与 20 国集团、经合组织、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相关的区域论坛合作，成为进一步加强该领域国际合作的催化剂。为此，应当加强一项参与型、基础广泛的税收问题国际合作对话。

162. 由于资源不足及缺乏专门知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处理逃税和避税做法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据此，能力发展措施应日益侧重于国际税收问题。

打击非法资金流动

163. 如上所述，除制定政策打击基于逃税目的的转让不当定价外，应对反洗钱(包括金融行动任务组及其网络和区域机构)、反腐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资产追回(追回被盗资产倡议)等领域的现行国家标准和工具予以最佳利用。

164. 一些辖区有允许公司和个人有效藏钱的监管机制，因而助长了逃税、洗钱和腐败。需要采取国内行动以使流入秘密辖区的资金流尽可能最小，并开展国际合作旨在增强资金透明度。这包括信息共享、逐国报告及公开公司受益人所有权登记、有效执行金融行动任务组标准及资产追回。

加强主权债务危机的预防和解决

165. 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妨碍国家资助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债务危机往往导致资本外逃的加剧、货币贬值、利率上升和失业。有效管理债务以预防债务危机被视为优先事项。但是，当危机发生时，迫切需要公正、迅速地解决。国际社会已经通过并反复加强了一项综合框架，以解决一组重债穷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于双边官方债务，巴黎俱乐部及其埃维安方式可对拖欠其成员国的债务进行重组。但是，全球的负债局面并未改变：重债穷国倡议几近完成，拖欠非巴黎俱乐部国家及私营部门的债务相当可观。

166. 关于国际债务重组的一项近期调查显示，以市场办法对拖欠私人债权人的债务进行重组需要进一步改进。⁶³ 许多债务重组被视为不够充分且往往延迟，对于债务国人民来说成本高昂。阿根廷拒绝重组的债权人的近期发展使得人们对拒绝重组的债权人有能力危及债务重组成功深表关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是如此。

167. 处理主权债务重组，通常有两种二选一的解决办法：一是通过合同规定，如债券契约中的集体行动条款等，采取基于市场的合同做法；二是类似于国家破产机制的法定做法。2003 年，为部分回应 2002 年阿根廷不履行责任，基金组织提出主权债务重组机制，虽然当时对该机制的政治支持微不足道。相反，在新兴市场债券发行方面，集体行动条款普遍使用。到 2005 年，近 100% 的新债券发行纳入集体行动条款，虽然大量债券仍未纳入集体行动条款。但是，一些行为人发

⁶³ 基金组织，“主权债务重组——最近的事态发展及其对基金组织法律和政策框架的影响”(2013 年 4 月，华盛顿特区)。

现，仅有集体行动条款不足以确保所有案例完成公正、有效的债务重组。⁶⁴ 纳入累计条款有助于集体行动条款在处理拒绝重组的债券人方面更加有效。

168. 各个官方论坛、政策智库和私营部门正在讨论如何改进陷入债务窘境国家的主权债务重组框架。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包括在基金组织、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在开展工作。⁶⁵ 此外，有人呼吁就公正有效的主权债务重组及债务解决机制采取行动，同时考虑到现有框架和原则，确保债权人和债务人广泛参与，以及给予所有债权人同等待遇。鉴于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性以及债务危及可持续发展的融资，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继续努力，加强主权债务重组的现行构架。此外，采取协作努力改善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两方面申报系统为基础的主权债务数据的及时性和覆盖面，就可以促成更可靠的债务可持续性评估。

促进监督和会计制度的协调以及数据革命

169. 强劲、相关和相似的数据，是改善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后续行动的基础。但是，当前的信息流、报告标准和监督机制相互重叠、相互矛盾、覆盖范围不完整，而且发展行为者经常难以获得。为了提高统计质量，必须减少当前报告框架和倡议的碎片化，并增强它们的一致性。国际社会应商定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适当监测框架，以跟踪各种来源产生的可持续发展资金流，并透彻和独立地报告发展和气候筹资承诺。还需要为监测和会计框架的协调和进一步融合做出努力，以审议所有资金来源及其在国家一级的相互影响。此外，应改进现有监测和报告框架，以避免刺激使用无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手段。

170. 因此，应加强国家统计能力。能力建设倡议和交流经验及做法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特别是跟踪、监督和评价不同类型资金流的影响和执行。加强国家监测和核算资金流的能力，包括通过在全国范围采用适当的标准和报告形式，也将有助于确保相互问责和全球透明。还应进一步探讨合并主动(例如报告)和被动(例如网站)透明机制的潜力，以确保向利益攸关方、赞助者和受益者披露情况并保持透明。

⁶⁴ 见 Ran Bi、Marcos Chamon 和 Jeromin Zettelmeyer，“未发生的问题：主权债务重组的协调失灵”，WP/11/265 号工作文件(基金组织，2011 年，华盛顿特区)；Michael Bradley, James D. Cox and Mitu Gulati，“The Market Reaction to Legal Shocks and Their Antidotes: Lessons from the Sovereign Debt Market”，*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39, No. 1 (January 2010)；Udaibir S. Das、Michael G. Papaioannou 和 Christoph Trebesch，“1950-2010 年的主权债务重组：文献调查、数据和事实概述”，WP/12/203 号工作文件(基金组织，2012 年，华盛顿特区)；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2)。

⁶⁵ 见“Draft principles on promoting responsible sovereign lending and borrowing”，可查阅 http://unctad.org/en/Docs/gdsddf2011misc1_en.pdf。

171. 为便利分享数据，例如关于混合资金的数据，各行为者可以缔结研究数据协议，此举将以现行报告标准为基础，并用于收集与项目有关的数据及公布这些数据。

172. 近期世界银行开展的工作为评估可持续发展需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 and 融资重点、使用模式化诊断工具及利用多国数据库，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这种分析作为试验在乌干达得到应用，并将扩大到另外 10 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国家。

加强全球伙伴关系，促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合作

173. 千年发展目标 8 所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蒙特雷共识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促进发展所做的一系列承诺。2015 年后发展议程必须以重振和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为基础，确定联合国会员国的承诺协定，同时为与广泛的利益攸关方接触提供机会和灵活性。已有旨在加强发展合作影响和实效的全球平台，这包括联合国发展合作论坛和其他已有的倡议(见第六节，C 小节)。

174. 可持续发展包括在筹资方面有效合作，需要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多边和双边发展筹资机构、各国议会、地方当局、私营部门实体、慈善基金会、民间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富有意义地介入和主动积极地参与的全球伙伴关系。当前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努力，应考虑到相关联合国大会和其他倡议，尤其以国家自主权原则为基础，注重通过包容性伙伴关系、彼此透明和问责交付成果。在此背景下，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互补性质非常适用。作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一部分，促进发展合作影响和实效的进程应继续并得到加强。

八. 结束语

175. 委员会在上文阐述了其在过去 12 个月里联合开展工作得出的结论。委员会相信，本报告提出的政策选项以及其工作所依据的战略做法，将为将来关于可持续发展融资的讨论提供基础，并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报告一道，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提供依据。

176. 委员会希望本报告中的建议和分析将激发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讨论，并启发新的想法和创新性解决办法。其中许多建议呼吁各国之间交流看法和分享经验，并在崭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定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至 1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见大会第 68/279 号决议)及其筹备进程将聚集所有利益攸关方，为推进这些讨论提供机会。委员会期待在此次国际会议及之后背景下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

附件

委员会各届会议成员

第一届会议(2013年8月28日至30日)

1. Andr Lohayo Djamba(刚果民主共和国)
2. Admasu Nebebe(埃塞俄比亚)
3. Karamokoba Camara(几内亚)
4. Ahmed Jehani(利比亚)
5. Joseph Enyimu(乌干达)
6. Mansur Muhtar(尼日利亚)
7. Lydia Greyling(南非)
8. Ji Zou(中国)
9. Lukita Dinarsyah(印度尼西亚)
10. Mohammad Reza Farzin(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1. Aiboshi Koichi(日本)
12. Amjad Mahmood(巴基斯坦)
13. Sung Moon Up(大韩民国)
14. Khalid Al Khudairy(沙特阿拉伯)
15. Emiliya Kraeva(保加利亚)
16. T nis Saar(爱沙尼亚)
17. Viktor Zagrekov(俄罗斯联邦)
18. Vladan Zdravkovi (塞尔维亚)
19. František Ru i ka(斯洛伐克)
20. Francisco Gaetani(巴西)
21. Eduardo G lvez(智利)
22. Dulce Mar a Buergo Rodr guez(古巴)
23. Janet Wallace(牙买加)
24. Reginald Darius(圣卢西亚)

25. Samuel Moncada(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26. Nathan Dal Bon(澳大利亚)
27. Pertti Majanen(芬兰)
28. Anthony Requin(法国)
29. Norbert Kloppenburg(德国)
30. Liz Ditchburn(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各区域组提名的委员会候补专家成员名单

1. Ali Mansoor(毛里求斯)
2. Rajasree Ray(印度)
3. Chet Neymour(巴哈马)
4. Saúl Weisleder(哥斯达黎加)
5. Troy Torrington(圭亚那)
6. Jaime Hermida Castillo(尼加拉瓜)
7. Gaston Lasarte(乌拉圭)
8. Antonios Zairis(希腊)
9. Özgür Pehlivan(土耳其)

第二届会议(2013年12月2日至6日)

1. André Lohayo Djamba(刚果民主共和国)
2. Admasu Mebebe(埃塞俄比亚)
3. Karamokoba Camara(几内亚)
4. Ahmed Jehani(利比亚)
5. Joseph Enyimu(乌干达)
6. Mansur Muhtar(尼日利亚)
7. Lydia Greyling(南非)
8. Ji Zou(中国)
9. Lukita Dinarsyah(印度尼西亚)
10. Mohammad Reza Farzin(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1. Aiboshi Koichi(日本)

12. Amjad Mahmood(巴基斯坦)
13. Sung Moon Up(大韩民国)
14. Rajasree Ray(印度)
15. Emiliya Kraeva(保加利亚)
16. T õnis Saar(爱沙尼亚)
17. Viktor Zagrekov(俄罗斯联邦)
18. Dragan Źupanjevac(塞尔维亚)
19. František Ružička(斯洛伐克)
20. Francisco Gaetani(巴西)
21. Eduardo G álvez(智利)
22. Dulce Mar í Buergo Rodr íguez(古巴)
23. Chet Neymour(巴哈马)
24. Troy Torrington(圭亚那)
25. Samuel Moncada(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26. Nathan Dal Bon(澳大利亚)
27. Pertti Majanen(芬兰)
28. Anthony Requin(法国)
29. Norbert Kloppenburg(德国)
30. Liz Ditchburn(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各区域组提名的委员会候补专家成员名单

1. Ali Mansoor(毛里求斯)
2. Khalid Al Khudairy(沙特阿拉伯)
3. Chet Neymour(巴哈马)
4. Sa ùl Weisleder(哥斯达黎加)
5. Reginald Darius(圣卢西亚)
6. Jaime Hermida Castillo(尼加拉瓜)
7. Gaston Lasarte(乌拉圭)
8. Antonios Zairis(希腊)

9. Özgür Pehlivan(土耳其)

第三届会议(2014年3月3日至7日)

1. Andr Lohayo Djamba(刚果民主共和国)
2. Admasu Nebebe(埃塞俄比亚)
3. Karamokoba Camara(几内亚)
4. Ahmed Jehani(利比亚)
5. Joseph Enyimu(乌干达)
6. Mansur Muhtar(尼日利亚)
7. Lydia Greyling(南非)
8. Ji Zou(中国)
9. Lukita Dinarsyah(印度尼西亚)
10. Amjad Mahmood(巴基斯坦)
11. Mr. Takeshi Osuga(日本)
12. Khalid Al Khudairy(沙特阿拉伯)
13. Sung Moon Up(大韩民国)
14. Rajasree Ray(印度)
15. Emiliya Kraeva(保加利亚)
16. T nis Saar(爱沙尼亚)
17. Viktor Zagrekov(俄罗斯联邦)
18. Vladan Zdravkovi (塞尔维亚)
19. František Ru i ka(斯洛伐克)
20. Francisco Gaetani(巴西)
21. Eduardo G lvez(智利)
22. Dulce Mar a Buergo Rodr guez(古巴)
23. Chet Neymour(巴哈马)
24. Reginald Darius(圣卢西亚)
25. Samuel Moncada(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26. Nathan Dal Bon(澳大利亚)

27. Pertti Majanen(芬兰)
28. Anthony Requin(法国)
29. Norbert Kloppenburg(德国)
30. Liz Ditchburn(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各区域组提名的委员会候补专家成员名单

1. Ali Mansoor(毛里求斯)
2. Mohammad Reza Farzin(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 Janet Wallace(牙买加)
4. Saúl Weisleder(哥斯达黎加)
5. Troy Torrington(圭亚那)
6. Jaime Hermida Castillo(尼加拉瓜)
7. Gaston Lasarte(乌拉圭)
8. Antonios Zairis(希腊)
9. Özgür Pehlivan(土耳其)

第四届会议(2014年5月12日至16日)

1. André Lohayo Djamba(刚果民主共和国)
2. Admasu Nebebe(埃塞俄比亚)
3. Karamokoba Camara(几内亚)
4. Ahmed Jehani(利比亚)
5. Joseph Enyimu(乌干达)
6. Mansur Muhtar(尼日利亚)
7. Lydia Greyling(南非)
8. Ji Zou(中国)
9. Lukita Dinarsyah(印度尼西亚)
10. Mohammad Reza Farzin(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1. Takeshi Osuga(日本)
12. Khalid Al Khudairy(沙特阿拉伯)
13. Sung Moon Up(大韩民国)

14. Rajasree Ray(印度)
15. Emiliya Kraeva(保加利亚)
16. Tõnis Saar(爱沙尼亚)
17. Viktor Zagrekov(俄罗斯联邦)
18. Dragan Zupanjevac(塞尔维亚)
19. František Ružička(斯洛伐克)
20. Gastón Lasarte(乌拉圭)
21. Saul Weisleder(哥斯达黎加)
22. Dulce María Buergo Rodríguez(古巴)
23. Chet Neymour(巴哈马)
24. Reginald Darius(圣卢西亚)
25. Cristiane Engelbrecht(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26. Nathan Dal Bon(澳大利亚)
27. Pertti Majanen(芬兰)
28. Anthony Requin(法国)
29. Norbert Kloppenburg(德国)
30. Liz Ditchburn(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各区域组提名的委员会候补专家成员名单

1. Ali Mansoor(毛里求斯)
2. Amjad Mahmood(巴基斯坦)
3. Janet Wallace(牙买加)
4. Eduardo Gálvez(智利)
5. Troy Torrington(圭亚那)
6. Jaime Hermida Castillo(尼加拉瓜)
7. Francisco Gaetani(巴西)
8. Antonios Zairis(希腊)
9. Özgür Pehlivan(土耳其)

第五届会议(2014年8月4日至8日)

1. Andr Lohayo Djamba(刚果民主共和国)
2. Admasu Nebebe(埃塞俄比亚)
3. Karamokoba Camara(几内亚)
4. Ahmed Jehani(利比亚)
5. Joseph Enyimu(乌干达)
6. Mansur Muhtar(尼日利亚)
7. Lydia Greyling(南非)
8. Mohammad Reza Farzin(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9. Lukita Dinarsyah(印度尼西亚)
10. Amjad Mahmood(巴基斯坦)
11. Takeshi Osuga(日本)
12. Khalid Al Khudairy(沙特阿拉伯)
13. Sung Moon Up(大韩民国)
14. Rajasree Ray(印度)
15. Emiliya Kraeva(保加利亚)
16. T nis Saar(爱沙尼亚)
17. Viktor Zagrekov(俄罗斯联邦)
18. Dragan Zupanjevac(塞尔维亚)
19. František Ružička(斯洛伐克)
20. Gaston Lasarte(乌拉圭)
21. Sa l Weisleder(哥斯达黎加)
22. Dulce Mar a Buergo Rodr guez(古巴)
23. Janet Wallace(牙买加)
24. Reginald Darius(圣卢西亚)
25. Cristiane Engelbrecht(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26. Nathan Dal Bon(澳大利亚)
27. Pertti Majanen(芬兰)

-
28. Anthony Requin(法国)
 29. Norbert Kloppenburg(德国)
 30. Liz Ditchburn(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各区域组提名的委员会候补专家成员名单

1. Ali Mansoor(毛里求斯)
 2. Ji Zou(中国)
 3. Chet Neymour(巴哈马)
 4. Eduardo Gálvez(智利)
 5. Troy Torrington(圭亚那)
 6. Jaime Hermida Castillo(尼加拉瓜)
 7. Francisco Gaetani(巴西)
 8. Antonios Zairis(希腊)
 9. Özgür Pehlivan(土耳其)
-